

專題記者成長計劃 政治 台灣

陸生與台派教授：跨越海峽的照映

他看著我時，看到的是「我」，還是「中國人」？



從深圳眺望一河之隔的香港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編者按：這篇報道是端傳媒「專題記者成長計劃」的成果。2024年，端傳媒推出「專題記者成長計劃」，為青年記者提供專業支持，共同維繫深度報道的行業生態。我們在第三期推出「微觀台海」組，希望在海峽議題日趨白熱化的當下，用有溫度的、觀察入微的記錄，搭建普通人的故事。這是「微觀台海」組的第二篇報導，來自一位在台就讀傳播碩士的學生。

我有預感，今天不得不袒露自己的身份。

這是在政治大學修讀傳播碩士的第五個月，林元輝教授跟我約了面談，打算聊聊我的期末作品和之後的學位論文。

他問我：「你為什麼來台灣唸書，你爸爸怎麼看？你媽媽怎麼看？」

我答不出來。

「我不是想挖你隱私，只是想更了解你的生長背景，看看怎麼在學位論文中發揮。」林元輝繼續追問：「你在哪裏長大？」

「深圳。」

「長大到多大？」

「一直。」

他驚訝地說：「所以你是大陸人？」

我凝視著老師，點了點頭。那一刻，他才知道我是拿著香港身份證來台的「陸生」。



2024年12月11日，羅湖，經羅湖口岸入境香港的天橋。攝：鄧家烜/端傳媒

邊界

我從小生長在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，家住羅湖口岸附近。過了海關，穿過一條綠色幕布的長廊，就能到達香港東鐵綫起點，羅湖——既在深圳、也在香港。

我爸爸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媽媽來自廣東某個小鄉鎮。婚後他們在邊境定居，爸爸在香港工作，週末和假日往返深圳。

媽媽和爸爸雖然都講廣東話，但兩邊的用語和腔調仍有差異。媽媽和我們講話時，用的都是靠近爸爸的語言；偶爾跟娘家人講電話時，才會拾起原本的腔調。那些「奇怪」的腔調，總被我和姐姐取笑：「媽咪，你講話怎麼會有鄉音！」

香港的家人講起大陸和媽媽時，會用「大陸人」、「上面落來噶」（上面下來的）這類標籤，語氣裏透著輕蔑。依稀記得媽媽曾說：「他們看不起我啦。」

上了幼稚園，我才慢慢學會普通話。彼時媽媽曾焦慮地問老師：「她不會講普通話，會不會適應不了？」

而放假去香港時，記不清是爸爸還是姐姐曾跟我說：「不要在香港講普通話喔，要講粵語！」

那時，我還不需要回答自己是哪裏人。

十八歲之前，我都在深圳唸書。這是一座移民城市，身邊同學來自中國各省份。不過，當同學們討論星空衛視的電視劇、追台星時，我只能一臉茫然、尷尬地笑笑。因為我們家的電視都轉到香港的TVB頻道，媽媽打開收音機，聽的是香港的電台和新聞，留意香港的天氣和日常。

姐姐跟我一樣在邊境長大。疫情後她「回歸」香港發展，接着決定跟伴侶和小孩在香港落地生根。

來台灣讀書前，我問姐姐：「到台灣後，我要怎麼介紹自己？說自己在深圳唸書長大嗎？」

「不要，就說自己是香港人就好了。」

姐姐似乎早已拋棄了曾在中國成長的身份，毫不猶豫地進入香港人的世界。我們共同成長的記憶和土地，以及還來不及披上「香港人」身份的我，都被遺落。

當我踏出桃園機場、搭上計程車時，司機聽到我的流利普通話，問我：「你是從中國來的嗎？」我說對啊。

「我幾十年前也去過中國啦，中國……嗯……好像很亂喔，人的素質也不高……」

我們在車廂裏沉默了幾秒。我對從小生長的那片土地的記憶好壞摻半。記得疫情那段日子裏，政府突然從嚴苛的「動態清零」轉向全面開放，接著各路專家的口徑也從「要嚴防死守」變成「這只是一場小感冒」。

那時我正一個人躺在租屋處，高燒40度，靈魂出竅。耳裏傳來隔壁房間此起彼伏的咳嗽聲。「只是一場小感冒」，荒謬到讓人後背發涼。

司機接著問我怎麼來到台灣。

「我爸爸是香港人，我香港戶籍，來台灣唸書。」

車內空氣暖了起來。「香港啊！那可先進啦，國際化大都市，教育啊、外貿啊、金融啊，都比台灣好多了！」

我記得第一天上林元輝的報導文學課，只見一位滿臉花白鬍子、背著舊書包的老頭氣喘吁吁地走進教室。是那位在傳院官網介紹中，經歷一欄空空如也，只寫了研究專長☐報導文學和台灣史的神祕人物。

他從書包側邊掏出一個塗層已磨損的紅色保溫杯、戴上老花鏡，接着，拿起手邊的學生名單逐個點名，讓我們回答問題。

「伍圓你是香港的。」林元輝點到我的名字，我僅禮貌微笑。

每當台灣同學和老師默認我的香港身份，眼神露出好奇與歡迎，都讓我感到隱約的不安。他們眼裏的這份善意，真的屬於我嗎？

課後，我在谷歌輸入「林元輝」三個字，網站跳出新聞片段。新聞影片裏，中天新聞的記者上門圍堵，他氣得丟下一句：「你們的立場我很清楚，不方便。」隨即關上研究室的門。

闔上電腦，我倒吸一口氣。老師知道我的身份後，會直接判定我的立場嗎？他會像對待影片裏的記者一樣，對我生氣地關上大門嗎？



2025年7月26日，台北榮星花園，大罷免的開票活動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他者

我的身份於這片土地，是個刺點。

2025年4月，台灣正如火如荼進行大罷免，每天打開Threads都會看到各行各業在呼籲連署。學校的「野火陣線」邀請了不同學院的教授輪流在羅馬廣場進行短講。

四月的天氣已逐漸溫暖，現場的學生和群眾、震撼人心的演講者，讓那天的溫度格外酷熱，宛如盛夏。

政治系教授葉浩說：「作者常用價值中立來正當化自己不作判斷，並且合法化在面對不公不義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的退縮。」

廣電系教授陳儒修則說：「如果你沒有辦法表達清楚你的立場，只說自己中立、不表態，這代表你其實是反對的立場。」

我並不想成為在不公不義面前選擇沉默的人。但在這場政治運動裏，我沒有辦法清楚表達自己的立場。

若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應該會支持大罷免。2019年——甚至在更早的時間節點，早已能看出，香港想保持主體性和民主自由，最好是離「祖國」遠一點。我能體會民主自由的珍貴，不想看到台灣被一個我熟悉的極權政府吞噬。

但我如果是一個百分之百的中國人，或許會感到無辜，「為什麼我來到這片土地上生活，卻不被歡迎？我也只是想在新的地方過好生活而已。」

生長在邊境，難以分清自己屬於哪一邊，是我一直以來的人生課題。

那段時間，新聞頻頻推播：定居台灣二、三十年的陸配，突然被要求返回大陸補一份戶籍注銷證明。我也因為中國出生的背景，在台居留證到期時，被要求提交「回鄉證」或中國的除籍證明。

來台兩年，我感覺自己重新在這片土地上「生長」，但這一刻，恐懼浮出水面。「如果移民署發現我在中國居留了很久，會把我驅逐出境嗎？」我害怕別人的眼神不再是好奇和歡迎，而是想把我「掃地出門」。

異鄉人為什麼離開家鄉，選擇在台灣留下來——我想以此為畢業作品的題目，探問：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，但台灣是一個可以容納差異、甚至對立面身份的舞台嗎？

和林元輝討論畢業作品時，他說：「你這個範圍太大了，我覺得你想寫的其實是中國人的故事吧。」

我愣了一下。我想寫的是中國人的故事嗎？他聽起來語氣篤定。

那次對話，林元輝反覆提及「你們中國」。我無法確定他指的是哪一種「你們中國」。

我坐在操場發呆一下午。林元輝是我來台後最信任的人，我內心總有許多想說卻不知如何開口的困惑，他像是能透過我寫的題材，讀出我內心想法的人。但他看著我時，看到的是「我」，還是「中國人」？

我在林元輝眼中是「你們中國」，但在其他中國人眼中，卻又不同。別人好像總是比我更確定我是誰。

一次我跟一名在台十年的陸生王同學聊天。王同學2015年來台灣，剛好是蔡英文當選總統、馬英九退位的交接時期。

那一年，同時也是陸生來台就讀的高峰，註冊人數高達3019人。中國自2020年4月起暫停陸生新生來台就讀學位，僅有當時已在台就讀的舊生可繼續升學。2025年博士、碩士班註冊的陸生，已不到百人。在台陸生成了稀有物種。

王同學聊著他在台唸書後，日常遇到的差異：「去醫院看病時，我拿出來的身份證明，是一張單薄的A4紙。」

我感到不可思議：「為什麼只有一張A4紙，你沒有居留證嗎？」

「你跟我們不一樣啦！」他自然地回應我。



2021年，苗栗，一間荒廢廟宇裡的蔣介石像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顯影

我帶著生命和身份的困惑走向林元輝，但「你們中國」這句話，讓我感覺被推開。小時候，我與自己的身份，隔著一條河；現在，我與信任的人，隔了一個海峽。

「你們中國」那場對話後，我兩個月沒跟老師聯絡，再次寫信聯繫，是我向他提出採訪邀請。我想要了解他的生命歷程，也想在這過程中，讓他看見我的複雜性。他同意了。

又到了新學期，我與老師相約見面，那天他給我申請獎學金的推薦信和一張小紙條，紙條上頭是一篇報導的標題 *How Tokyo became an unexpected haven for China's middle class*。密密麻麻的一串字母，有劃掉又重新書寫的痕跡——後頭還有手寫附上翻譯版本的連結網址。

林元輝說：「上面有寫中國人潤出去日本的故事，或許會對你漂泊的位置有所啓發。」

在他眼中，我仍然是「你們中國」，但他也在尋找理解「中國人」的方式。這場採訪，不知會將我與林元輝的關係帶向何方。

我匆忙來到約定採訪的休息室，窗外是隨風晃動的樟樹。這是第一次用記者身份跟林元輝聊天，我再次披上還不屬於我的外衣，假裝專業。林元輝看着我匆忙的樣子，語氣擔心地問道：「你吃飯了嗎？」

這句話是卸下緊張的咒語。雖然我不知道自己此刻的身份到底是什麼，但有人以關心的目光注視我。

我開始了解他走過的路。

林元輝出生在1950年代的南投縣水里鄉。爸媽先後在彰化火車站、水里經營流動攤販謀生。回憶兒時，他說自己是爸爸媽媽花三百大洋買來的，「我是家裏老大，又是養子……所以很早就懂事了。」他每天透早幫爸爸推著二輪車到離家幾公里的騎樓擺地攤；下課後趕回攤位，坐在小板凳上一邊寫作業一邊顧攤，幫媽媽算數，用舊報紙幫客人包裝貨物。

中華民國教育下，林元輝一直認為自己是中國人。直到1972年到政大讀書，同學拉著他去龍山寺聽立法委員增額補選選前演講，「我是中南部上來的孩子啊，傻哩呱唧的去了。」

當時黃信介已於1969年增額補選為立法委員，幫助黨外人士康寧祥助選。他回憶道：「黃信介這時候講話很直白喔，而且講的都是俚語，一些極端的言論也都講出來了。」

龍山寺廣場前站滿了群眾，擠的幾乎腳不沾地。四根竹子搭上一塊帆布的臨時演講台被西裝革履與草根市民包圍，觀眾的眼神凝視著演講者，充滿著對未來的希望與憧憬。

那是林元輝第一次從政治人物口中聽到二二八事件。他的本土意識開始萌芽。

後來他從父親那裏聽到家族與二二八的關係。林元輝的爺爺在日治時期經營雜貨仔店（tsáp-huè-á-tiàm），一次南下高雄進貨，不幸給美軍B-25轟炸機炸死。

當年林元輝父親僅十五歲，南下高雄為父親收屍，但到了以後才發現，已無父屍可收，只剩下千人骨灰。

無錢返鄉，林元輝的父親留在高雄賣醃番石榴營生。二二八事件發生時，憲兵全城搜捕，他的父親不願透露逃亡者行蹤而遭到逮捕，羈押在後來改為陸軍服務社的憲兵隊。

「血肉面貌出現在眼前，就像是刀割在自己身上那樣的痛。」談起這段往事，林元輝如此描述他的感受。

他在政大唸書的那幾年，學校教官與學生同住一棟宿舍。教官會定期游說學生入黨，教官曾問林元輝：「你怎麼還不入黨，我一看你就是有☒青年啊，有☒青年就是要入黨！」

林元輝說：「教官你看錯人啦，我對政治沒興趣，我怎麼可能是有☒青年，我就下三爛！」

四、五十年後，我與當年這位自稱對政治沒興趣的同學經過政大後山蔣公銅像時，他說：「這是我想方設法跟學校反映要撤掉的東西！中正圖書館前面的已經被移走了，這個沒辦法啦。」

我偷偷地想：「蔣公在政大最害怕的人，應該是林元輝吧。」



2020年1月3日，台南，二戰時期日軍建造的防空洞。攝：Ann Wang/Reuters/達志影像

異鄉人

在日本留學時，林元輝常獨自一人走到公共電話亭打電話。電話的那頭是在日服務台灣鄉親的台灣青年社，同時也是日本的台獨聯盟。

他每次會先換好兩、三千日圓的銅板，站在電話亭裏一打就是二、三十分鐘。直到銅板花光光，才捨得離開。

電話裏播放著錄製好的錄音帶，談著台灣發生的事。有時是幾個月前的消息，有的甚至是一年前的舊聞，對他來說，都是讓他捨不得掛電話的「家事」。

「我不敢在宿舍附近打電話。」他會跑到幾個街區外日本人的社區找電話亭，避開台灣同胞，「他們有可能是國民黨的間諜。」

我和他一樣，身處異鄉，但在「同胞」身邊，卻更孤獨。

在報導文學課上，曾有一位來自中國的交換生報告《唐山大地震》。

林元輝補充：「掌權的人都會把事情說得很正面，但《唐山大地震》這篇文章很寫實，有在暗暗諷刺政府。」陸生點了點頭，提到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中國的朦朧詩也是以晦澀的方式來批判政府。

我對這位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產生了濃烈的好奇。

課間，我趁機跟他說：「我在寫一個微觀台海的專題，我相信在兩岸緊張的局勢下，人與人之間仍有對話的空間，你願意跟我聊聊嗎？」

他眼神裏露出了一點期待、興奮但又很快謹慎起來，他說：「可以啊，但是有些政治話題不能聊，因爲我還要回中國，不想被認出來。」

但下課後他急匆匆向我走來，低下頭湊到我耳邊說：「對不起，我不能接受你的採訪，人大是黨的學校，我也看了一下來台交流的規定，陸生不能在台交換期間接受採訪。」

我愣在原地，腦袋裏飄過很多個說服他的理由，但最後什麼都說不出來。離開教室後，我收到他的訊息：「抱歉，我只是想過好自己的生活。」

對方接著傳訊確認：「今天課堂上的發言，拜託幫我刪掉。」

一種闊別已久的無奈和生氣再次湧上我的心頭——爲什麼只是表達自己的想法，都能讓人這麼恐懼？

林元輝說：「你們中國來台的留學生，只有旁邊沒有同胞的時候，才比較敢講。」

我緊握着拳頭在學校的操場繞圈，鞋底反覆踩過同一塊藍色跑道，那種熟悉的感覺，讓我想掙脫，卻又徒勞。



金門的海岸上，一架荒廢的砲車。圖：陳焯輝/端傳媒

照映

留日時，林元輝一邊唸書一邊到東京的《聯合報》當記者，有機會採訪在日台獨份子史明。

史明以政治犯身分流亡日本，在東京池袋開設「新珍味」中華麵食店，林元輝上門採訪時，順道在那吃了飯。

「他們家的餃子很好吃，還有酸辣湯。」他一邊回憶一邊說。日本的餃子和台灣的不同，日本一般吃煎餃，而台灣人習慣吃水餃。

跟林元輝一樣，我也很常在台灣吃餃子。不是因為餃子好吃，而是水餃帶來一種平淡、日常，是充滿熟悉感和安全感的食物。

但食物的味道對我來說有時也極其危險。

來台的第一個端午節，學校生僑組的老師給每位僑生發了兩個粽子。我興奮地打開粽子，裏面有鹹蛋黃、半肥瘦豬肉、香菇和咸香的糯米。

吃了兩口，眼淚毫無預兆地掉了出來，我在食堂裏一邊抽泣、一邊吃完它。粽子讓我想起家的味道，可是，我的家到底在哪裏？

隨着逐漸適應在台留學的日子，想起「故鄉」時的感覺，似乎越來越複雜。心裏思念的聲音會被我無意識地調到最小。我開始排斥它、甚至避開談論它，好像這樣就可以切斷我與它的臍帶。

但那一口粽子，讓長期被壓抑的孤獨、思念、身份的飄零……被引了出來，無處可逃。

有次採訪，我問林元輝：「你為什麼覺得外省人來台灣種蘋果是因為思鄉？」

他笑著反問我：「你會不會思鄉？」

我沉默，他接著說：「思鄉就是吃個熟悉的東西然後就會掉眼淚嘛。」我想起了因一口粽子而落淚的自己。

一個冬夜，我們在猴山岳圍著一鍋熱湯邊吃邊聊，戶外可俯看整個台北的夜景，遠方高樓的燈光在黑夜中閃爍，不時吹來一絲冷風。店裏的小貓、小狗也跟我們一起圍著桌邊的熱湯取暖。

他笑着說自己是一位很愛吃美食的人。

他和父母的關係並不親近。直到考上政大，先後到日本、美國進修，成為博士歸來，家裏視他為榮耀，親子關係也才逐漸有了變化。

大學畢業時，父親特意北上幫林元輝把家當搬回水里。離開之前，還專程帶他到萬華龍山寺前的夜市飽餐一頓，才捨得南下。

多年後他的母親罹癌過世，家裏只剩父親。晚年父親也因鼻咽癌離去。林元輝回憶起與家人的關係，總會因為無法回家照顧父母而感到虧欠。

我剛開始工作的第二年，母親患上癌症。那時我已搬出家裏，很少回去。一邊過自己的生活，一邊感到愧疚。她過世前三個月，我才回到她身邊。

有次上課，林元輝突然自言自語又像丟出提問一般，說了一句：「到了我這個年齡，那我活著的意義是什麼？我的生命在凋零啊……」他的語氣很輕，教室裏一片安靜，他沒有等待學生回應，又接着繼續講文章。

自母親去世後，我也不斷問自己同樣的問題。

鍋中的雞湯喝到過半，老師一邊用湯匙攪拌了一下湯底，一邊對我說：「這鍋湯喝不完，你帶回去喝吧。」

來台後，我最想念的是湯。那種熬了很久很久的味道。

我想起身份被揭露的那場對話，老師臉上驚訝又努力平復的表情，是我熟悉的「溫差」。起身離開時，我轉頭和老師說：「老師，你要做我的指導教授喔。」他說：「我可以陪你走一路。」

眼前林元輝一邊咀嚼雞肉，一邊對著隔壁小貓「喵鳴」。此刻，我既不是「你們中國」，他也不是「台派老師」。

換上記者身份站在他面前那天，生澀的採訪結束後，老師從手掌心裏變出了一顆青綠色的樟樹果子，跟我說：「樟樹和台灣的歷史很有關聯。」我放在鼻子前聞了聞，果子散發著幽香。現在它躺在我的書桌上，變成了深褐色。